



從小學教師到人類學博士 的觀察與省思

小学校教師から人類学博士への観察と思索
My Thoughts about Education from an Aboriginal Teacher to an
Anthropological Doctor

文・圖—Yobu Losing 黃約伯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我在1991年台北師範專科學校畢業後（今台北教育大學前身），就回到家鄉的小學教書。這所小學位在limongan（現在的新北市烏來區福山里），離我生長的部落（烏來里）約有17公里，屬偏遠的學校。當時我的班上有6位學生，算是人數最少的班級之一。不過，這反而讓我有更多時間跟學生互動（打球、游泳、放陷阱、家訪、做功課、煮東西給學生吃等）。另外，校長和主任見我和另一位張老師是校內較為年輕的老師，可以多學學行政方面的事務。因此，我們2位就分別兼任了訓導組長與教學組長。如今回想，那時覺得日子雖然過得非常忙碌，卻很充實。有時在部落，我都會用泰雅語跟當地居民聊天，除了聊學童的學習狀況以外，也會聊部落的大小事務，包括過去、現在與未來。有時，居民會告訴我，我的父親（Losing）與母親（Yuyoh）幾十年前在這個部落與他們互動的情形，聽來格外親近，就像跟長輩聊天一樣。有時，居民也會聊學童的成長與學習狀況、社會處境與未

來可能的發展。在這樣的互動過程中，我便開始關注原住民族教育的各種議題，特別是教育成就（educational achievement）的問題。

與從教師到考取公費留學攻讀人類學

1994至1997年間，我利用四個暑假至台北師範學院暑期學士班進修。1997年，考取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開始從事有關原住民族教育（indigenous education）的



政大烏來樂酷團隊老屋新生活動 地點：現今烏來部落之一處民宅。



韓國田野調查，地點在慶尚南道金海市天理傳道廳。

對我來說，到異國社會進行研究，算是一個新的挑戰。每當面臨困難時，我都會採取正向的態度去面對，我當時覺得，假以時日，只要能突破這些瓶頸，這些困難未來都會變成極大資產。後來事實證明，也是如此。



相關研究，包括參與師大教育研究所兩位師長——譚光鼎教授與張建成教授所主持的兩項關於台灣原住民教育的研究計畫。這兩個計畫，與原住民學生教育成就的議題有關，包括原住民教育政策與原住民專門人才的培育與運用。具備了教育研究的基礎能力之後，也促使我想從不同的角度（如人類學或社會學），繼續深入探討原住民族的教育議題，例如：教育制度的跨國分析。

1998年，我考取教育部公費留學獎學金，先後在英國倫敦政經學院（LSE）與布里斯托大學（University of Bristol）取得社會（或文化）人類學的理學碩士與博士。記得第一次跟英國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David見面時，他就說：「在英國，你若想取得社會人類學的博士學位，一般都會至異國社會（或民族）進行研究。你既然從台灣來，本身又是原住民族，也曾經做過台灣原住民族的研

究，你要不要試試看做其他社會的研究？」。我心想，這跟當初想從事原住民教育制度跨國分析的研究也有關，於是接受了老師的建議，這也成為我後來從事跨文化研究的濫觴。我的博士論文，《日本新宗教(天理教)的海外佈教》，便是在日本、台灣、以及英國這些地區進行田野調查的結果。對我來說，到異國社會進行研究，算是一個新的挑戰。每當面臨困難時，我都會採取正向的態度去面對，我當時覺得，假以時日，只要能突破這些瓶頸，這些困難未來都會變成極大資產。後來事實證明，也是如此；同時，從事異國社會（民族）的研究，會讓我有機會省思過去在台灣所從事的研究方法與論述。例如，我在日本時，和日本民眾互動之後，慢慢認識日本社會，也了解日本民眾歷經多次社會變遷（如幕府式微、明治維新、太平洋戰爭等）所採取的應對方式，包



2015年5月起，我開始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開啓了一個嶄新的學術生涯。這段期間的研究重點，是博士研究的繼續深化與擴展。我近年的獨立研究成果，也陸續在發表於國內外學術期刊。當然，我希望以上述的研究成果為基礎，據以檢視、比較、反思與擴展我從前的研究，包括原住民族教育的相關研究。



括對傳統文化的矜持與保存、當代生活的調適與創新，甚至是未來社會發展的想像與因應等。有了這樣的體認，讓我對於日本教育制度的分析，例如Ainu Education Policy（愛努教育政策），比較有深切的認識，這對於我未來在做跨國原住民族教育制度的分析時，論證將有所依據，想法也將較為周延。

學成歸國的博士後研究

2013年學成歸國以後，次年加入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湯京平特聘教授所主持、民族學系王雅萍副教授擔任執行長的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三年整合型計畫之研究團隊，計畫名稱是「大學社會實踐的制度創新：政大與烏來的樂酷發展—大學夥伴關係與整合式社區治理的實踐」（2013到2015年），簡稱為「政大烏來樂酷計畫」，成為博士後研究人員。該計畫旨在發展大學與社區夥伴關係建立與發展的永續合作模式。當時的研究團隊成員來自不同的學科領域，包括政治學、公共行政學、經濟學、傳播學、廣告行銷學、地政學、民族學、應用數學，以及社會工作等。此一學科多元的工作環境，無疑提供給我一個跨領域合作與研究的機會。我也發現，國外大學如美國的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Arizona、Harvard University、Dartmouth College、University of Oklahoma、University of Alaska-Anchorag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Davis、Trent University，以及University of Minnesota-Twin Cities等學校，實際上都已經進行類似的方案，也頗具成效，特別是近年國際一些原住民族高等教育機構，也開始相互構築國際教育網絡。例如：2002年，世界



中研院民族所—東亞宗教論壇。



2014年參與新竹部落大學的年度評鑑。

原住民族高等教育聯盟（WINHEC）的建立，便是最明顯的例子。2012年，我國也曾經首次舉辦該組織的年會活動，值得肯定。不過，WINHEC近年也出現了一些運作上的問題，這是我未來在從事跨國教育制度分析時，想持續深入探討的地方。

展望原住民族教育研究的新未來

2015年5月起，我開始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開啟了一個嶄新的學術生涯。這段期間的研究重點，是博士研究的繼續深化與擴展。我近年的獨立研究成果，也陸續在發表於國內外學術期刊。當然，我希望以上述的研究成果為基礎，據以檢視、比較、反思與擴展我從前的研究，包括原住民族教育的相關研究。

回顧我之前的研究歷程，是以原住民族的教育研究為起點，再逐步擴充至人類學領域。冀望未來，能繼續在這些領域上，繼續

從事研究，並對於政府現行所施行的相關政策，提出建議。在人類學與教育方面，希望從人類學的角度，探討不同社會孩童社會化（socialisation）的歷程。這個部分，人類學與教育學（例如教育社會學、教育心理學、多元文化教育等領域）已經在世界各地累積不少的民族誌資料，特別是1990年代以來，歐美的教育人類學者已經開拓不少有關

這方面的研究領域，企圖結合傳統與現代的詮釋方法，提供新興研究取向與論述。換言之，我將以過去的研究為基礎，並參照近年的人類學與教育學研究資料，陸續整理、分析與比較當前原住民教育政策（indigenous education policy）的發展與挑戰。近十幾年以來，台灣原住民族教育的整體發展，也展現若干嶄新的風貌。當然，若能將台灣過去與現行的原住民族教育政策之改革內容與執行成果，與世界其他各國作法相互參照，並進行跨國教育制度的分析與比較，或許是未來可以努力的方向之一。◆



Yobu Losing
黃約伯

泰雅族。新北市烏來區烏來部落（Mstranan）出身。1970年生，1991年台北師範專科學校畢業，曾任教於新北市的福山國民小學。英國布里斯托大學（University of Bristol）社會人類學博士。現為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助研究員。